

記

者

生

涯

談

片

羅祖光

初幹採訪工作的時候，很多前輩同業直呼我「小老弟」而不名，幹了三兩年之後，繼之而起的同業們又頻呼我為「羅老哥」，及至最近，忽又被人尊稱為「老前輩」了，當我聽到「老前輩」的稱呼時，實是羞愧交集，因為像我這樣的一個新聞工作者，那能算是前輩，祇不過是馬齒徒增，濫竽充數了二十年而已。因此，當中外編者要我在九一記者節前夕寫點採訪經驗談時，我實在是感到惶恐萬分，我既不能像新聞界前輩們一樣的提供些令人欽羨的談資，但又不願落個擺臭架子的不肯執筆的罵名，所以我祇有以戰戰兢兢的心情來談談我作採訪記者時的幾件趣事，以饜「中外」讀者諸君。新聞採訪技術，日新月異，倘因我寫出過去的一些陳舊採訪方法，能讓繼起的同業，不再蹈我的覆轍，則不勝企幸。

客串茶房的記者

不以一個記者的身份去採訪新聞，這是我始終想不通的一個經驗，時間是在三十七年秋，蔣總統引退溪口，共匪在長江以北正是咄咄逼人之

時，人心浮動，因此，當時的一批投機份子，利用國人於久戰之餘的厭戰心理，紛紛以和平使者自居，處處呼喚「和平」，就在那個時候，南京方面傳出一位名叫李明揚的立法委員已經渡江去見當面匪酋陳毅去了，當時這個消息越傳越廣，但始終沒有人能證實這件事。一天下午大約是五時左右，我正與美聯社的訪員饒引之兄在國民大會堂門口交談時，我發現一位穿灰布長衫，呢帽緊壓着眉毛，手裏提着一個小包袱的人，從大會堂旁門疾步而過，我直覺的感到他就是李明揚，雖然我過去與他沒有交往過，但是立法院我是常去的，所以我依稀記得他那付容貌，我匆忙的向饒兄告辭，沿着國府路向北町住李的背影，當李走到益世報隔壁的一家汽車行時，他僱了一輛營業汽車向下關方向駛去，而我也急急的想僱一輛營業汽車尾隨，因為那時候南京沒有臺北這樣方便的計程汽車，上車前還要先講價錢，當價錢談妥上車之後，却又見不到李所乘的車子，這時候我祇急得叫司機加速馬力向下關方向行駛，當車行過鼓樓至陝西路口時，我車子的司機發現李所

乘的車子正停在路口邊，由於我所乘的車子與李所乘的車子是同一個車行的，所以我這位司機問起了他那輛車的客人時，那位司機手一指，就指向三葉旅社，這時我格外的相信這個人就是李明揚了，因為陝西路口離三葉旅社還要走一百五十碼以上的路，而乘客竟遠遠的下了車，其中一定有道理，於是我也付了車錢下車步行到旅社。

走進旅社大門，我就走向靠左面的櫃檯問那位賬房先生，剛才有沒有有一位叫李明揚的旅客前來投宿，那位賬房先生不假思索的說，沒有姓李的旅客來投宿，於是我把早我幾分鐘進入旅社的那位先生形容了一番，賬房先生似有所悟的說：那位先生是昨天由江北來的；他不姓李；姓黃，這時我想到李明揚可能不會用真的名字住旅社以減少麻煩，於是我問他住幾號房間，我想去看看他，賬房先生似有難色的說，黃先生關照過，他很累，任何訪客他都不願見，我在沒可奈何的情

作者簡介：羅祖光先生曾任記者採訪主任，現任自立晚報總編輯。

形之下，掏出一張名片遞給賬房先生。他一看名片就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他很乾脆的說：「記者先生恐怕他更不願見了。我越是聽到賬房先生的解說，益發相信這位「黃先生」就是李明揚，因此我想見他的心情更為迫切，所幸賬房先生還很合作，最後他竟答允我的請求，權充茶房去見這位怪客。不過，賬房先生一再叮囑，千萬不能露出記者的身份，否則他們的生意就不好做了，我連忙回說：「你放心好了，我要是露了馬脚，不但連累你們的生意，連我忙了半天的大新聞也要丟掉了。」

這時賬房先生叫過一個茶房叮囑了幾句，就叫我跟他到後面的下房裏換裝，我脫下了西服換上茶房常穿的藍布長衫，然後就端了一盆洗臉水送給黃先生，到了黃先生房門口，心中撲通撲通的跳，最後我還是一聲黃先生，洗臉水送來了，我聽他哼了一聲，順手就推開房門進去，這時黃先生正和衣在牀上，看到洗臉水送來也就起身了，我忙不迭的瞧了他一眼，我好像有觸電似的感覺。因為這位所謂的黃先生，正是我所知道的李明揚，雖然我明知他並不認識我，但我擔心他看出我的破綻，於是我打囉的說，黃先生你太辛苦了，我跟你泡壺茶來，說着我掩了門退出房間，我忙着到前面向賬房先生討壺茶，同時我又告訴他我的發現，當我捧着茶壺再走進李明揚的房間時，他正在洗臉，我一方面倒茶，一方面藉機搭訕。

「黃先生，江北最近怎樣了？」這是我的開場白。

「這幾天連着下雨，路難走極了，」李明揚

雖然隨口的答腔，我却緊抓住機會接下去說：「黃先生，你是起早來的，有沒有碰到八路？」

沒想到李明揚竟滔滔不絕的打開話匣子，他先把江北情況描述了一番，然後我又緊追了一句「先生，你看能「和」嗎？」

「和」這個字在他聽來並不感覺驚奇，因為他是忙着這件事的，因此，他斬釘截鐵的說「和」談何容易，我看是和不了了！顯然他也是失敗了。不過他還是有解釋，他說共產黨現在氣勢凌人，認為過江來取南京已不成問題了，所以他們不願「和」，但是他們還是要放出願「和」的空氣，表示他們是愛「和平」的，我聽到這裏已經已經是得到了答案，我又端着那盆他洗過的臉水推門而出，回到下房換上西服再走到賬房先生那裏，向他告辭，賬房先生一再叮囑寫稿子要當心。

我回到報社開始撰寫這篇特稿，向讀者報導了李明揚向「權威人士」暢談江北局勢的新消息，同時也打破當時一般人的和平的夢，事後想起來採訪這條消息竟權充了茶房，實在是好笑。

從匪區發出消息

正當大陸局勢節節不利之時，讀者對「和」戰」的消息至為關切，而我身為記者，自是應向此一方向去努力。時間是在三十七年冬季的某一天，邂逅了中央大學教授吳裕厚，他告訴我，他們組織了一個「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準備前往北平與共黨談和，由於我年青好動，而且認為這是一個實地到匪區去採訪的好機會。因此，我請求吳教授同意我隨行。吳教授說，這件事要

得到行政院同意才行，因為飛機是行政院付錢包的，當我跑到行政院去找某一負責的人時，行政院的這位高級官員說：「行政院沒有意見，還是去向代表團接洽好了，當我再找到吳裕厚時，他欣然同意我的隨行，當我決定隨行的消息同業們知道之後，上海報社有兩位同業，和南京的另兩位報社同業也跟進，洽妥了隨團前往北平。」

我們所乘的包機是屬於中央航空公司的，當飛到青島時，因等待共匪的同意，我們在青島又住了五天，最後共匪同意代表團飛往北平，並同意包機飛到北平上空時，機場的電臺會開放來聯絡，預計電臺開放的時間是下午四時半，我們在飛機上大家都緊張，除了飛機的馬達聲而外一切都是沉默的，時針已指到四時廿五分，我們從機窗外望，已清晰的看到紫禁城，可是電臺沒有開放，飛機祇好在上空盤旋，一直到了五點鐘，仍然不聞電臺開放的訊息，駕駛員到後艙來說：「電臺沒有開放，機場情況不明，降落是危險的，向回程飛油又不够，因各位是負有使命的代表，所以我要問問你們的意見。」

駕駛員這一說大家都給楞住了，因為兩者都是性命交關的技術問題，最後還是駕駛員作了決定，他說南苑機場我是比較熟，我們試試降落，隨時叮囑我們繫上安全帶，然後他回進了駕駛艙，當我們感覺機身在轉彎時，我坐的靠右邊窗外已看見了一條長長的水帶，我直覺的感到這就是永定河，當我將臉緊貼窗上去看的時候，忽然聽到兵兵兵的聲音，而飛機好像正抬着頭向上直衝，全機的人都感到奇怪，祇有正副駕駛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他們轉入民航之前都是

空軍的老戰士，記得副駕駛在擴音器裏叫着說：「大家鎮靜點，共匪的槍炮都朝我們打了」，誰料就在這個時候，「卜」的一聲，飛機稍爲有了點擺動，因我們沒有這個經驗，雖緊張但還不感到嚴重，可是駕駛員心裏有數，他嚷着大家抓緊安全帶不要亂動，飛機中彈了，駕駛員不說飛機中彈過則罷了，一說飛機中彈，大家已好像死之將至，什麼話都說出來了，但我所能判別的不外兩種意見：有的說我知道共黨不講信義，我不來你們又一定要我來，又有的說來都來了懊悔什麼？總之機艙的混亂情形是可以想見的，當飛機拉到一萬二千公尺高空時，駕駛員鬆了一口氣告訴大家飛機右輔翼好像是中了步槍的子彈，還無大碍，各位不要亂動。

可是飛機既不能降落，又沒有足夠的汽油向回飛的問題又重現於各人的腦際，大約是五點十五分的光景，忽然機場的電臺有消息來了；據駕駛員說共產黨真滑稽，他們的來電；以爲我們是國民黨的轟炸機，所以防空部隊誤發了炮火，讓各位飽受虛驚，隨即指示我們的飛機降落。

飛機降落之後，祇見那跑道兩旁，大約每隔十步就有一個穿棉大衣的匪軍拿着槍對着飛機停着的方向，機門啓開，匪北平軍管會的王姓交際處長登上飛機，向代表們假惺惺的表示了歉意。然後轉過身來對我們記者說：「對不起你們在機上請勿下來，因爲我們沒有奉到關於接待你們的指示」，說着就將「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的代表先生們載上汽車駛向北平城。

到了七時左右，共匪派了一名操蘇北口音姓

高的匪幹來照料我們，讓我倆在機場的辦公室中吃晚飯，然後就給我們舖了幾張行軍床，另外又把室內煤爐的火燒得大大的，我把厚重的皮大衣脫掉喝了一口茶，我發覺牆角邊有一具電話，這時我想起了一位曾經在南京電訊局長途臺服務過的小姐，她在半年前調到北平服務了，因爲她是北方人的緣故，我存着認探的心情，拿起話筒就叫接長途臺，很意外的這位小姐正在值機，我說了半天，她才聽懂了我已到達北平，我這時又連想起，來北平之前，共匪會同意先開放北平與上海之間的無線電，於是我問她有沒有辦法拍個無線電出去，由於我們過去在南京的相識都是爲了拍發新聞電訊，所以她也毫不猶疑地答允我，可是問題來了，怎樣付費呢？這時我請她把我北平親戚家的電話號碼查給我，我通知我的親戚請他們代我付費，結果一切都順利，我擬了一個簡短的電稿，大意是說：「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團」一行九人，已於午後五時半抵達北平，代表們下榻六國飯店，明日將展開他們的工作。

電稿擬好，再用電話報給長途臺的那位小姐，她說電報祇能拍到上海，拍到南京是沒有辦法，我立即與同往北平的上海新夜報的一位同業商量，請他的報館代轉南京益世報，他同意了，電報發出去了，當我回到南京之後才知道新夜報把這則新聞電作了它的獨家新聞，而沒有轉致南京益世報，由於當時的情況無法說清楚，要不然的話，這條新聞不應該由他的報紙獨家刊出來了，但不管怎樣這總是我做外勤工作所盡的一份努力，事後想起來，還是感到非常快樂的一件事。

關於匪機投降的消息

十年前突傳匪米格十五型機八架集體投誠的消息，那時候我正在臺北大華晚報擔任外勤工作，幾乎臺北市的報社都在發號外說匪機投誠了，而我回到報社編輯部時却一口咬定了沒有這回事。我記得當時耿修業社長很光火的對我高聲指責，他說：「我這張報紙斷送在你的手上。」因爲我知道修業先生對於新聞的認真，但是我沒有辦法去說服他，我是在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去處理這條新聞，最後我還是我採訪此一新聞的經過都寫進新聞裏去，因爲我曾經在那短暫的時間裏，以電話詢問過國防部二廳的廳長、參謀次長，以及正在圓山飯店宴客的空軍總司令，他們都直截了當的回答我沒有這回事，由於我深信這條足以振奮人心的消息，有關方面沒有封鎖的理由，所以我在新聞中引用了他們答復我的話，同時也說明了沒有這回事。

可是，一般讀者寧願信其有而不肯信其無，甚至到了第二天報不再提這件事的時候，很多如痴如醉的讀者，還打電話到報社來要求退訂報紙，罵我們消息太不靈通，耿社長爲這個問題，悶悶不樂了好幾天，而我就好像漏了大新聞似的給報社同仁們嗤之以鼻。

日子久了，大約經過年把的時間才算平靜下來，事後我檢討，我認爲做一個外勤記者頭腦必須冷靜，常識必須豐富，尤其需要的是對事物正確的判斷力，當然盡你自己的努力，勤快謹慎的去，即使有錯亦不會有大錯，最怕的是不加思索的人云亦云了。